



明清江南文才甲天下及其原因

范金民 (南京大学历史研究所青年教师)

雕鞍劲弩,令人首先想到剽悍的北方草原民族,而杏花春雨,则使人免不了提及江南的文人学士。明清江南鸾旗斩将者寥寥无几,而峨冠博带的饱学之士却代不乏人。下面,让我们浏览一下这个地区人文荟萃为天下最的盛况,及其人文活动所凭藉的客观条件。

科举考试几乎是明清两代取士的唯一途径,而被誉为“洛阳之花”的进士则是明清人才的最主要部分。江南所中进士居于全国首位。每科唯一的状元,江南占了大部分。清代的112位状元,光苏州一地就占去25人。清初汪琬曾将状元作为苏州土产向同僚夸耀。绵绵不绝的众多的进士充实到封建官僚队伍中,成了封建体制的实际决策、执行者,鉴于苏松二府为财赋重地,朱元璋规定,苏松之人不得官户部。然而到明后期,户部十三司胥算都成了吴越人。非独如此,朝中要位也多被江南人把持。光昆山一县,就有任吏部尚书、刑部尚书与侍郎、京兆尹、翰林院掌院、太常侍卿、大理寺丞、通政使、大学士者,其它台省、侍从之臣,更彬彬不可胜数。

明清两代江南的藏书家也足可称道。吴晗先生编撰《江浙藏书家史略》一书,收录藏书家889人。江南八府为657人(部分为唐宋元时人),占73%,实际上还远不止此数。他们主要分布在苏州、南京、松江、常州和杭州。著名者如王世贞兄弟,毛晋、王鏊、甘福父子,文征明叔侄,孙七政祖孙,黄丕烈、黄虞稷、丁丙、刘承干等,所藏之书数量多,年代久,刊本精。

江南更以多名人、多大家著称。诗文有所谓明初“吴中四杰”的高启、杨基、张羽、徐贲,人以唐代王、杨、卢、骆目之,加上高逊志等六人,合为十才子,又称北郭十友;有明中期反对三杨“台阁体”的前七子之一的徐祯卿,其诗“熔炼精警,为吴中诗中之冠”;有明末清初的有学无行的“两朝领袖”钱谦益,他高举诗文大纛,俨然为一代宗主;有清初的吴伟业,其“诗文工丽,蔚为一时之冠”

有清中期的袁枚,“骈体最工,抑扬跌宕,有六朝人体格”。词人则清代先后有“廓清之功”的“云间词派”、“悲慨激扬”的“阳羨词派”,盛世崛起的“浙西词派”和以词论见长的“常州词派”,词坛名流囊括殆尽。古文有归有光,他与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相颉颃,竭力推崇唐宋古文。其文得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诸家之妙,恢宏中富情趣,端凝中存清新。即使与之力相抵排的王世贞也不得不承认,“千载有公,继韩欧阳”。

史学家有潘耒、王鸿绪。他们通贯经史、音韵,算有及宗乘之学,清修“明史”,其功尤多。文史巨擘则数王世贞。他主文坛二十年,全国士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奔走门下,惟恐后时。得其片言褒赏,身价骤起。所著《弇州史料》、《弇山堂别集》,内容宏富,论述独到,堪为史苑瑰宝。小说家有三言作者梦冯龙。梦龙与其兄梦桂和弟梦熊被时人称为“天下三冯”。戏曲艺术创作有沈璟及其“吴江派”。思想家有清初三大家之一的顾炎武。他以明道救世为治学宗旨,痛诋空谈性理、不务实际的宋明理学,而倡经世致用新论。他的“天下兴亡,匹夫与有责焉”的名句至今还在激励着人们。他探究治世之道,凡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之属,无不穷究原委,考正得失。其几十年的辛勤成果,汇为《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和《肇域志》等书,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必不可少的重要史籍。社坛领袖有顾宪成兄弟、张溥“张采娄东二张”,陈子龙、夏允彝等。他们办书院,结复社、几社,互为呼应,抨击时政,切磋学问。二张号召天下,影响尤大,四方好名者争走其门,尽名为复社。史学评论家有钱大昕、王鸣盛和赵翼。所作《廿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和《廿二史札记》,为清中期的三大史评著作,独占了史学评论园地。考据大师有胡渭、惠氏祖孙三人、沈彤、江声、余肖客、王鸣盛、钱大昕、庄存与、刘逢禄等一大批人。先后形成“吴派”和“常州学派”(段玉裁属“皖派”)

“吴派”的代表人物惠周惕为创始者，惠士奇为继承者，惠栋为发展者。史载“清二百余年读汉儒学者必以东吴惠氏为首”。“吴派”与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并驾齐驱，平分清代汉学秋色。书法绘画有明中期的戴进、沈周、文征明、唐寅、祝允明。沈、文师徒文、诗、画、书法皆精，尤工于画，沈为“明世第一”，文系“画冠一时”。祝、唐两人则“工于书法，名动海内”。明末有蓝瑛、董其昌。董之书画成就又在文、沈诸人之上。他们先初形成了“吴派”、“武林派”和“华亭派”。清后有以龚贤为首的“金陵派”，笔法“沉雄深厚”（王伯敏语）。清前期的吴中“四王”（王时敏、王鉴、石谷、王原祁）是势力最大的山水画家，影响画坛近两个世纪。四王一派又分为娄东和虞山两派，影响所及，产生“小四王”与“后四王”。明初的蒯祥与清初的梁九是卓越的建筑大师，主持修建了巍峨壮丽的北京宫殿。徐光启是“杰出的近代科学先驱者”、“把西洋近代科学思潮和方法介绍到祖国来的首创者”（竺可桢语）。王锡阐是天文历法学家，著有《晓庵新法》。洪亮吉是清代颇有见地的人口学家。顾祖禹是成就卓越的地理学家，缪荃孙是著名的目录学家。朱骏声是语言学家。龚自珍是启蒙思想家。薛福成是改良主义政论家，曾出任英、法、比、意四国大臣。翁同和是军机大臣、光绪帝师，清末维新派的代表。洪钧是出任驻俄、德、奥、荷的四国公使。陆润庠系清末皇帝宣统的老师，在苏州创办了苏纶丝厂和苏州丝厂。其它或卓然成家，或见重当世者更不知凡几。

江南弹丸之地，而文才独多，名流辈出，称冠全国，究其原因，不外以下几种。

明清时期的江南，特别是苏松嘉湖一带，是全国首富之区。《明史》云，“苏、松、常、镇、嘉、湖、杭七府，供输甲天下”。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税粮2940多万石，而江南八府为668万石，占近23%。光苏州一府就达280多万石，居然多于湖广布政司的征输。这种独重的状况，历明迄清一直未变。明廷将苏州倚为“外府”，清朝则视之如“家之有府库、人之有胸腹”。重赋固然表明统治者对江南人民的敲剥程度，但也反映出江南的供给实力和经济状况。

江南气候适宜，雨量充沛，土壤肥沃，十分有利于农业生产。其农业精耕细作的程度高于全国其它地区，农产量也远在他地之上。一亩之收，高者

达四石，可抵北方二十亩之产。素有“苏杭熟，天下足”的美誉。江南不但作物产量高，而且商品性作物种植极为普遍。最突出的是栽桑和植棉。湖州一府，嘉兴、杭州大部，苏州西部和沿太湖一带，是著名的种桑养蚕区。田间几无旷土，春夏之间绿荫弥漫。松江、常州二府，太仓一州，苏州的常熟、昆山等县，嘉兴的部分，则是著名的产棉区。除了农业、副业，江南的手工业也极为兴盛，南京、苏州、杭州、嘉兴和湖州等大中城市，以及星罗棋布的市镇，是丝织业、棉织业、踹布业等几十种手工业的集中之地。农副工各业的发展又为商业的繁盛创造了条件。都会之地字号林立，百货并陈，徽州巨贾、闽粤行侩、宁绍众商、山西标客、江淮贩子，骈凑辐至，喧闹杂沓。正是这繁荣的工商业作为农业经济的补充，使江南经济经久不衰。明人王士性说：“毕竟吴中百货所聚，其工商贾人之利，又居农之什七，故虽赋重，不见民贫。”清人唐甄也说，江南“虽赋重困穷，民未至于空虚，室庐舟楫之繁庶胜于他所”。

同样，也正是这发达的经济，为江南文人学士提供了活动的首要条件。无论是攻读应举、创立学派、著书立说、吟赋填词，赴社应会，还是搜罗古籍彝器、校刻群籍、考证名物，都需要强大的财力作后盾。顾炎武能手不释卷，遍读群籍，著述宏富，归有光、王世贞能成为一代大家，钱谦益能领袖诗坛，毛晋父子能筑汲古阁和黄丕烈建士礼居，蓄书数万册，无不与其家境饶富有关。而他们的富，也无不沾了江南这块宝地的光。明人高启赞江南，“财赋甲南州，词华并两京”，道出了经济对文化的重要影响。

优越的环境是人才兴盛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江南地区北靠长江，东傍大海，南依杭州湾，大运河贯通南北，境内更是水系成网，港湾遍布，舟楫相望。文人学士结社兴会，切磋交流，往返便利，信息传递便捷。江南山岱秀丽，泉水清冽，湖光山景，秀色可餐，园林胜景，触目皆是，俗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不少人便认为是江南的便利交通之灵秀之气毓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江南才子。袁宏道云：“山川之秀丽，人物之色泽，歌喉之宛转，海错之珍异，百巧之川凑，高士之云集，虽京都亦难之”。美好的环境又是文人学士卜居憩息赋诗填词的极佳场所。日夜喧阗，利来利往的城中市肆赋予文人作品浓郁的生活气息。江南藏书居全国之首，

书肆林立,册籍充栋,翻检容易,购买方便,上至三代彝鼎、秦汉玉石,下至宋元珍本,鲍校毛抄,无所不有,这又是读书人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江南书院,崇轩敞楹,布列其间,有杨绳武、夏之蓉、钱大昕、卢文弨、姚鼐、朱筠、程恩泽、胡培塿、任泰、缪荃孙、俞樾、冯桂芬等当世名流为山长传授学问,江南学子享尽其福,得益良多。于是乎,本地人虽远走他乡,犹时时回首;外地人虽相隔万里,也以漫游是地为乐事。在江南这一舒适的人间天堂里,文人学士优游自在,或寄情山水,或潜心学问,“或辩理诂义以资其学,或赓歌酬诗以通其志,或鼓琴瑟以宣壅滞之怀,或陈几筵以合宴乐之好”。钱谦益总结著名画家沈周的成器缘由道:“其产则中吴文物士风清嘉之地,其居则相城有水有竹菰芦虾菜之乡,其所事则宗臣元老周文襄王端毅之伦,其师友则伟望硕儒东原完庵钦漠原博明古之属,其风流弘长则文人名士伯虎昌国证明之徒。有三吴、两浙、新安佳山水以供其游览,有图书子史充栋溢杼以资其诵读,有金匱彝鼎法书名画以博其见闻,有春花秋月名香佳茗以陶写其神情”这些其实也是一般明清江南学人皆具的生活和成长环境。

社会风气关乎人文的消长。明清以科举取士,读书人一旦登第,便升以高官厚禄,诱使无数的人入其彀中。从而出现了“乡校间士人以举子业为事,或为古文词,众辄非笑之”的奇怪现象。自明中后期起,更以录取进士为荣,“士益向风,争相磨濯,攘袂以起”。然而关键的不是统治者的提倡,而是当地人的传统习俗。因为前者适用于全国各地,只有后者才是区别他地的决定因素。江南人读书喜文,有着悠久的传统和良好的习惯。士宦缙绅之家不必说,他们希望家业不坠,仕途不绝,读书登第,以增加财富,以保妻子,以荣乡里,就是其目的,从而延师设塾,增加智力投资,无不皆然。吴一鹏的父亲就曾“不使其子治生业,日督之学问”。常熟瞿元初之祖不但买田筑室,培养子孙,还源源不断地以资财接济

与其孙商讨学问者。归有光的祖母、母亲督课的情景尤为动人。即使非为世宦或书香门第,也决不放过求学入仕的机会。如广东按察司副使周济叔之父,当其子未显时,亲自督促,令子“从旁诵读,夜分乃寝,率以为常”。甚至连一些寒素子弟也发奋读书,以期跻上层行列。母督子、妻励夫的例子俯拾皆是。如顾一清者,家甚贫,其母“乃脱簪珥资给之而躬督学”。而钱文通者,为诸生时,“游乡学,勤苦特甚,夫人昼夜纺织以资给之,得专意于学问。遂取高科入翰林,以文名于世”。苏州人莫旦夸张地形容苏州是“家家礼乐,人人诗书”。“家弦户诵”,纺车声伴着读书声,其情景何等别致!一般百姓耳濡目染,见多识广,居然也能一、二句《诗经》、《论语》,读读《百家姓》,诵读《千字文》。这又与家不蓄书,有书不读的情形迥异。早在明朝宣德时期巡抚周忱经过长期观察后认为,“天下之民出其乡,则无所容其身,苏松之民出其乡,则足以售其巧”。周忱的话表明,苏松之人文化水准高,掌握知识多,所操技艺精。这除了经济、地理诸因素外,与长期的传统观念有关。归有光说:“吴为人材渊藪,文字之盛,甲于天下。其人耻为他业,自髫髻以上皆能诵习,举子应主司之试,居庠校中有白首不自己者,江以南其俗尽然。”江南学子还有个习惯是互相呼朋引类,一荣俱荣。松江人何良俊说“苏州士风,大率前辈喜汲引后进,而后辈亦皆推重先达,有一善则褒崇赞述无备至”。所谓文人“非得于师友之渊源,即得于家庭之传习”是也。正是在这种自幼诵读的风气熏陶下,显者世世相承,穷居者纷起效尤,友僚互相奥援,江南文才在相互提携相互激励中拔地而起。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江南文人之多,文化活动之昌盛,在全国居于首要地位。究其原因,在于这个地区经济最为发达,环境特别优越,社会习俗异于他方。经济与文化,地望与风尚,人才与环境几者统一到一个整体中,互相渗透,互相促进,从而产生了五个半世纪的壮观宏景。